

近代新学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王先明 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王先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920-1

I. 近… II. 王… III. 新学—研究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172 号

JÌN DÀI XÌN XUÉ

近代新学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王先明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920-1/K·618

2000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16.00元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一 问题的提出 | 1 |
| 二 学术史的回顾 | 3 |
| 三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 9 |
| | |
| 第一章 民族定位——新学民族性问题的再思考 ... | 13 |
| 一 “西学”说的历史考辨 | 14 |
| 二 “新学”的指属范围 | 20 |
| 三 “新旧”之争的启示 | 27 |
| 四 逻辑的结论 | 33 |
| | |
| 第二章 经世致用——旧学走向新学的 内在动因 | 40 |
| 一 经世思潮与学术文化的历史转向 | 41 |
| 二 “经世”之学的时代特征 | 49 |
| 三 从“经世”之学到“学习西方” | 56 |
| 四 “经世致用”与近代“新学” | 66 |
| | |
| 第三章 洋务运动——沟通“中西”学的桥梁 | 77 |
| 一 西学传入与新学形成的时差 | 78 |
| 二 “中西之争”与“华夷之辨” | 86 |
| 三 “致用”——接通中西学的切入点 | 100 |

2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 | | |
|-----|---------------------------|-----|
| 四 | “化西学为中学” | 113 |
| 第四章 | 戊戌“新学”——近代“新学”的初步形成 | 126 |
| 一 | “新学”形成的历史际遇 | 127 |
| 二 | “万木草堂”的“新学”体制 | 138 |
| 三 | 戊戌“新学”中的西学 | 146 |
| 四 | 戊戌“新学”与今文公羊学 | 156 |
| 第五章 | 兴学堂——近代“新学”的制度化建设 | 167 |
| 一 | 旧学体制内的变动趋向 | 169 |
| 二 | 新学制的探索与尝试 | 176 |
| 三 |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制 | 184 |
| 四 | 新学体制的最终形成及其特征 | 197 |
| 第六章 | 新旧比较——“新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 207 |
| 一 | “即中即西”之学 | 208 |
| 二 | 历史轨迹与基本内容 | 216 |
| 三 | 走向衰亡的“旧学” | 223 |
| 四 | 国学的兴起与新学的命运 | 237 |
| 第七章 | 中体西用——近代新学的文化模式 | 250 |
| 一 | 从“道器”论到“本末”论 | 251 |
| 二 | “中体西用”模式的形成 | 257 |
| 三 | “体用”模式的演变 | 265 |

| | |
|--------------------------|-----|
| 四 “体用”模式的历史作用 | 275 |
| 第八章 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 282 |
| 一 近代社会文明的历史需求 | 283 |
| 二 “新文化”的历史前提 | 291 |
| 三 新学与现代化——余论 | 300 |
| 主要参考文献 | 310 |
| 后记 | 314 |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近代“新学”似乎是一个人所皆知的问题。新学亦即西学,西学就是新学,一直是学术界比较确定的认识,从大学教科书到一些学术专著,均多持此论。但这确乎又是一个十分含糊的认识,因为从语义和语源意义上看,“新学”与“西学”是无法等同的。当然,在近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过程中,新学与西学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容,是语义学和语源学所不能容纳的。然而,即使二词的使用完全超越了语义和语源的意义(事实上不可能),那么,新学所指称的事物与西学所指称的事物就完全同一么?如果二者所指称的事物和所包容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那么两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和具有的意义也就不能够等同;如果二者所指称的对象完全同一,那么,同一内容和同一事物形成不同的两个称谓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正确把握和理解“新学”与西学概念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揆诸史实,我们发现,亲身经历了中学由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型过程的近代人,对于新学的界定远非“西学”一语所能尽。“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①把西学称之为新学,把中学称之为旧学,原本是西方传教士主办的“广学会”的宗旨;其后张之洞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旧体新用”,似乎又是“中体西用”的同义语。

^① 《广学会大有造于中国说》,《戊戌变法》(三),第214页。

2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此外,在不断变动的近代社会,关于新学的界说可谓异义并呈,理解不一:如冯自由所说,“是时孙总理、陈少白与康、梁师徒同倡新学”,^①如守旧派启秀所言“政治以人才为先,新学非圣无法”^②等;如国粹派的“故者所灭,新者即起”^③,维新派人士倡议的“不中不西”之“新学派”等,都远远超越了“新学即西学”的论说。

其次,“西学”本是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词语,而“新学”却是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于世的一个概念;而且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学”一词及其内容就逐步消匿不彰,而“西学”一词却仍十分活跃,至今不衰。因此,如果将“新学”和“西学”置于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个概念发展轨迹的曲线,是无法重合的,甚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比。这也是“新学即西学”说无法解释的问题。

再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对范畴,它们各自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学术文化形态。作为学术文化形态而言,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结构形式如何,相互间的历史关联和内容、结构上的联系和区别如何等,也都没有比较清晰的说明。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看,洋务时期的“中西之争”,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学术文化演进发展的几个特定历史阶段,虽然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内容上和历史上的联系,却并非同义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5页。

②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杨家骆:《中国近代文献汇编之一》,《戊戌变法文献汇编》,鼎文书局版,第46页。

③ 《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卷上册,第499页。

重复,而各有特定的内容和文化特征。因而,新学即西学的认识根本不能包容如此复杂深广的历史内容。

最后,新学是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进步人士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文化形态,如果它仅仅是西学的另一种表述,那么,为何近代“新学”家们又大多是具有精深的中学造诣,却又并不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等)?况且,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近代社会,“文化救亡”(如“学战”、“保教”、“国学”说的盛行等)一直是进步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的主题之一。如果作用于近代社会、文化的“新学”仅仅是西学,那么,学术文化的民族性及其救亡意识又如何融入其中?而且,源远流长的中学又如何完成其近代文化的转型?如此等等,都不是“新学即西学”的认识所能涵盖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因此,认真考究起来,近代“新学”又是一个人们“耳熟”却未必“能详”的历史课题。它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它自身的历史地位、民族定位等问题,仍有待于深入研究。而且,这不仅关涉到新学本身的评价,事实上也是直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和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基本发展规律与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学术史的回顾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新学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这一历史必然性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表现,本质上属于中学形态的一种时代演变。对此,汪康年当时就曾揭示过这种学术与时代的相互联系:

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即新学

4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作者注)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①

从中学本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学术文化内在演进的路径入手,去认识近代新学的民族属性和历史地位的学者,当首推梁启超。梁氏是近代“新学”巨子,也是与新学旗手康有为几乎齐名的人物。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总结和清理了清代及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认为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在兼取西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类型,它大体上由三种元素构成:一是经义之学,二是诸子之学,三是西学。其特点是一以复古为解放,二是无选择地输入西学,三是创获新识。^② 所以,梁将新学定位在中学的近代形态上(民族定位),同时也对其历史地位作了初步的评说,认为近代“新学”的兴起,被看作是传统旧学的衰落“则无可”,而若视之为“新思想启蒙”,则“未敢轻许。”^③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主要是侧重于学风流变来认识近代新学的。对于康有为的“新学”,钱评论说:“当时长兴讲学,卓然与乾、嘉以来学风划一新线之情景与其意义及影响,亦俱见矣。”“抑长素长兴讲学,所可大书特书者,厥为力反乾、嘉以来考据之学,而别求一新径。”但这一新学风的来源自有所出,“盖有所受之,受其师朱次琦也”。^④ 梁、钱的论证方法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却都认为新学是传统中学(即旧学)的近代演变。

① 汪康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戊戌变法》(三),第134页。

②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

③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册,第709、712页。

新学源自传统中学,并且在时代的推动下具有挽接传统与近代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在王国维的思想中表现的更加明确一些。“王国维对晚清新学的评价虽然有所保留,却没有采取简单的予以抹煞的态度。相反,他对清代学术的历史衔接意义极为重视。不错,他确实说过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而且认为宋以后至清朝,是我国思想的停滞期。”^①但王国维却从学术发展的历史大势上给出了新学的地位,认为三百年间我国学术文化凡三变:清初一变而为大,乾嘉一变而为精,道、咸又一变而为新。^②以大、精、新三字概括整个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论科学、公允与否暂且不论,但他注重于其间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特征,却是相当有见地的认识。这比简单地将新学比之于西学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所见也更为深刻。

其后,还有一些学术造诣极深的学者们,也是循着同样的路向,来拓展和深化自己的思想,认为近代新学乃是中学在兼取西学的基础上,由传统学术转向近代学术的产物,其间影响颇著者如顾颉刚、汪荣祖、陈寅恪等人。陈寅恪对于近代以来“新学”创立的历史特征,有一总结性论述: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③

①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见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② 参见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之《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第25—26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6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却没有认同中国学者们的“新学即西学”的认识,他们各自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充分论证了近代中国的“新学”思想家们传统中学的背景及其在新思想中的不容替代的地位。美国有影响的学者萧公权在他的新近出版的著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对于“新学”家康有为的思想源渊与其特征评论道:

康有为乃一“爱国的”儒者,努力使儒家传统以及帝政适应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新形势,以保国、保种、保教。他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并无很大的不同,所不同者仅程度而已:张之洞要保存传统中的中学(儒学),而借自西学的不过是技器;康有为则予儒学以非传统的解释,而且除西方的科技外更建议变法。因此,康氏较张氏激进,然两人一样热心使儒学的权威与影响绵延下去。^①

张灏在关于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中,对这位更加激进的新学家的思想从西学和中学两方面的影响入手,作了比较深入的对比分析。他认为以“新”相标榜的梁启超一贯倡导的用以“新民”的新学,并不仅仅是西学,而是以省察、克己为特征的儒学道德哲学与西方价值观的结合。在梁看来,某些中国传统技巧可被用来为西方服务,正如同西方一些技巧有时可用来为中国价值观服务一样,这完全是合乎自然的。新学的历史进程“向我们展示了在近代中国文化时代思潮中继续存在着的某些儒家成分。更重要的是,梁不是持有这种兴趣的唯一人物,在近代中国人和一般的东亚人中,新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道德哲学,有着持久的思想引力。”因此,近

^①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5 页。

代新学及其思想家们的历史充分表明，“儒家的一些思想成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近代西方的时代思潮相融合。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它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冲撞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还有待探讨。”^①

与上述主要研究“新学”家们个体思想状况不同，艾尔曼侧重于对晚清社会文化总体态势的探讨。他的研究成果同样表明，清代学术文化发展由汉宋之争到中西学之争，再到新旧学之争，这一由传统学术文化向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以及“中国近现代的许多重大发现不是偶然出现的。对甲骨文在古代中国研究上的潜在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由 19 世纪晚期西方传入中国学界的科学知识提供的。”“不仅是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影响的产物。……清代出现的考证学派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直接的连续性。因此，文革之后，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的宗旨竟然能再次复活，也就不足为怪了。”^② 晚清新学的兴起固然受到了西学的推动，但它的学术文化之本以及它由旧趋新的变动内因，当存在于中学之内。如果舍此而言新学，或误以新学即是西学，新学岂非无本之木？传统中学内在的动因对于学术文化的更新变迁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的论述不应被忽略：

对清代学术事业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那些以汉学（即对经典著作进行阐扬的一个流派，有时也称之为考据学派）为中心的书院，以及那些对汉学和宋学（即新儒学或理学，其对经典的阐释后来官定为科举内容）并重的书院。……书院鼓励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09 页。

②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8—179 页。

8 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学生们以批判的眼光广泛地阅读中国经典和历史。

……

尽管作为一种体制已经寿终正寝,但是,只要列举出梁启超、章炳麟、黄兴、吴稚晖(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名单)等这样一些在维新和缔造共和中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就读于书院,那就可想而知,几家大的书院,……在本世纪早期的中国学术和政治生活中,确曾作出过间接的贡献。……他们年轻时接受过书院那种学术自由和崇高理想的洗礼,后来才能够融会贯通中西学问而敢想敢为。^①

随着近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程度不同地开始重新认识近代新学问题。在《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一文里,冯天瑜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西学同中学一样,也有新旧之分,但以往中国人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因此,笼统地说‘西学即新学’,既未全面反映西学的实际状况,也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不甚吻合。”^②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出发,近代中国的新学也不能被看作是西学形态。冯天瑜说:“这里且不论新学的特定形态受到中国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仅就新学因袭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点而已,便不可将新学与西学混为一谈。”^③

李双璧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也比较明确地提出异议说:“戊戌后维新思潮的思想形态有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新学’的形成。‘新学’与‘西

^①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dited by Gilbert Rozman, 美国自由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3 页。

^{②③} 冯天瑜:《从清明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龚书铎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43 页。

学’不同,它是中国化了的东方版西学。……‘新学’实乃西学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相结合的产物。”^①此后,丁伟志(《中体西用之间》)、陈其泰(《清代公羊学》)等人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出发,对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性问题,都提出了很有启示意义的论述。^②

从以经学术史研究的状况和同内外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果来看,将新学定位于西学的认识,既失之简单笼统,也缺乏学理根据。因此,对于近代新学进行重新认识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思路

近代新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是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作为一个新的学术文化形态,它具有着不同于旧学的学理内容和文化模式;作为中学的历史发展,它也有着与西学不同的学理内容和结构模式。同时,它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产物,有所谓“心善维新之议,知讲求新学之决不容缓”^③的时代急迫性,而且也是推动近代社会变革的学术动力,是造就一代新人才的知识体系。“通过接受教育使人的知识结构由以往的‘卫道型’转向‘知识型’,由中世纪的‘士’转变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成为建设近代文明社会的生力军。”^④

因而,对于近代新学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源

① 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② 参见丁伟志、陈崧:《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左舜生:《戊戌得罪的皮锡瑞》,《万竹楼随笔》,第148页。

④ 吴根梁:《康有为〈教学通议〉析》,《近代史研究专刊》,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流及其演进趋向上展开；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传统旧学的内在结构因素和西学的结构因素上，分析研究形成近代新学的学术因素及其结构模式。同时，作为近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文化形态，它与近代社会文明的内在关系也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主旨之一。

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参照和基础，且为本书选题的确立具有认识意义上的启示。但现有的研究并不足以形成对近代新学这一特定学术文化形态的整体认识和全面理解：

其一，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新学相关方面的课题，如“中体西用”、“今文公羊学”、近代维新思想、变革思想及其思想家等。在这些具体研究中，他们涉及到了新学内容，并就其相关性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但一直没有系统、全面研究近代新学的成果。

其二，由于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问题仍未解决。在新近出版的有关论著中，新学即西学的说法仍很流行。如杨国强所著《百年嬗蜕》中说：“就中学（旧学）和西学（新学）所代表的不同时代内容而言，西学东渐过程里直接产生的每一个命题都曾间接或直接地带来过具有启蒙意义的影响。”^①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史研究》也还持旧说：

1840年鸦片战争后，……新学（西学）成为社会的主潮。

进步的思想家虽然也继续使用“实学”这一概念，但多以“西学”来充实它的内容。^②

甚至，新学概念理解上存在着混乱，时而径称之为西学，时而又语义不明地说它是传统经世学发展的结果等。^③因而，对于近代新学

① 杨国强：《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0页。

②③ 葛荣晋：《中国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当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深入发展的重要一环。

近代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时代转型,也是中学本身发展演变的一个历史过程。在整合中学和西学二元因子基础上形成的新学具有不确定性和不成型的特征,新学家们各自对于新学理解的侧重点也不完全相同。这给我们确切地把握近代新学的民族定位及其历史地位,带来了不少困难。

鉴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本书不准备就近代新学的历史评价过多展开讨论,只是试图客观地从纵横两个方面再现近代新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与西学和旧学的相互关系、它的基本内容和建构模式以及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联系。本书的基本思路和论证的框架因此而设定。

